

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

读白



孙昌建
著



读白

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

孙昌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白: 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 / 孙昌建著. —杭州:
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213-06717-4

I . ①读… II . ①孙… III . ①刘大白(1880~1932)—
人物研究 IV 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7736号

读白——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

作 者: 孙昌建 著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集团网址: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<http://www.zjcb.com>

责任编辑: 毛江良

封面设计: 王 蕾 王 芸

责任校对: 朱志萍

电脑制版: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9.8万 插 页: 2
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3-06717-4

定 价: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读白之一 读白缘起 / 01
- 读白之二 名字由来 / 013
- 读白之三 四大金刚 / 032
- 读白之四 驮着斜阳归去的诗人 / 064
- 读白之五 霞是最值得讴歌的 / 100

读白之六 学者和斗士 / 117

读白之七 绍兴三杰 / 137

读白之八 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 / 179

读白之九 西博会的那些事情 / 198

读白之十 《白屋书信》和诗人之疾 / 214

读白之十一 大白的家族和后代 / 232

读白之十二 当年的藏书都到哪里去了 / 261

附录 生前死后寂寞名 平水灵隐探诗魂 / 278

•CONTENTS•

■ 读白之一

读白缘起

公元1919年1月26日上午，大地一片雪白，杭州皮市巷，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人，正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位于3号的白屋前，当正欲敲门时，门却吱嘎一声地开了，于是便有了以下这样的对话——

啊呀呀，是子渊啊，快请快请！

大白，这样的天气你也要出门啊？

我想去看看雪景啊。

呵呵，这杭州可全成了白屋了

.....

两个中年男人，口中哈着热气，像孩子一样的谈论着昨夜的这场大雪。

是啊，这一场大雪，给了杭州一些久违的清冽和温情。而这个叫子渊的中年人，没有因为一场雪而不出门，却反倒因为大雪的到来，使得他来到皮市巷的脚步更为急促。这个

子渊便是经亨颐先生，时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（以下简称浙江一师）校长并兼浙江教育会会长，而这白屋的主人，便是诗人刘大白。

大白，雪一样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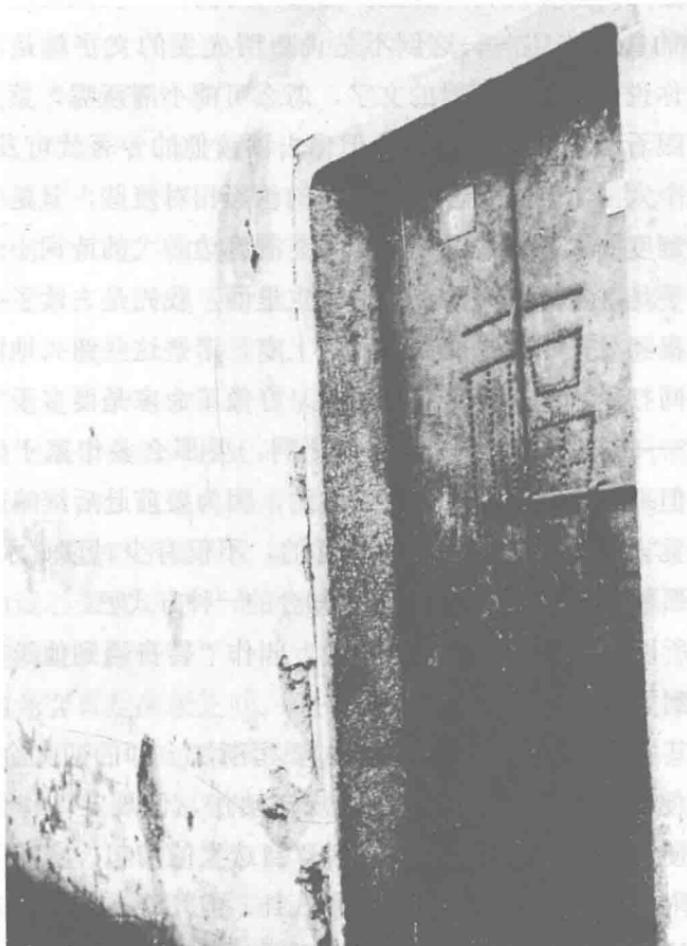
时光穿越90年的这段虚拟对话，宛如一闪而过的某个碎片。

当2009年我开始着手写作一本关于浙江一师的书时，我便开始了读白之旅。读白，读刘大白，读一个人和一个圈子、一个时代的故事。此白，既是刘大白名字的代称，又是其诗人精神的一种体现。在一片多彩纷纭的世界里，白是多么难得的一种底色啊。同时这个白也是一种空白，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瞬而过，留白甚多，我能否在空白处添上些许笔墨，或读出别样的意味来？这大概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用意所在。

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文学史家，不可能也没条件去钩沉史料，更不可能去写博士论文，因为我的导师不可能是别人，正是诗人刘大白，那么他会给我“论文”通过吗？

我跟刘大白，大概属于非亲却故的关系。我的老家也在绍兴，而我的职业也曾是教师、编辑和报人，这都是跟大白先生有所交集的地方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我也写诗，诗歌至少已经伴随我30年，这30年不能说无日不诗，但无诗不欢却是真的。这就是一种生存状态，也是一种情感状态。

读白之旅断断续续，开始写浙江一师的书带有一点任务性质，还好不是刚性的，也就由着我来写。本来嘛，即使是马拉松，也会有一个终点的，然而我跑着跑着便来了兴趣，收不住脚了——就像慢慢品绍兴黄酒，它没有53度白酒的那种猛烈，它的香醇和酒劲是需要有一个挥发过程的——渐渐地，我



▲未被拆除的皮市巷3号墙门

有了对影成三人的那种感觉，于是读白之旅，马不停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先是完成了《浙江一师别传：书生意气》，再是完成了《民国有个绍兴帮》这一厚一薄的两本书。

就我的口味而言，以故乡的文人为例，一度我更喜欢重口味的鲁迅先生——这倒不是说启明先生的文字就是小清新，你说那苦茶苦雨般的文字，怎么可能小清新呢？蔡元培乍一眼看去是人见人爱的，但你去读读他的专著就可发现，这是个太博大的人物，只是文学的色彩相对淡些，且是个喜欢定制度的人，而我又偏好那类在制度边游弋的诗词小说文章，于是，在跟绍兴沾点边的先生里面，我先是去读了孙伏园孙福熙兄弟，再扩而大之，把上虞、诸暨这些绍兴地区的都一网打尽，一个个名字数下去，好像革命家是要多于文学家啊——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啊，要那么多作家干什么呢？但那个年代革命家是不嫌多的，因为要前赴后继嘛。读革命党人的故事是我永远感兴趣的，不仅有少时读《水浒》时的那种淋漓痛快，也可算鉴古知今的一种方式吧。

所以，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，叫作“转身遇到他”——我遇到了刘大白。

其实也不是遇着，因为当时要写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，大白便是其中之一。这本来是规定动作，但规定动作做多了，便很想搞点自选动作，这种“自选”的初起，实在是因为依附在大白身上的一些传奇和八卦，但凡诗人身上总多少有点这种传奇性的。有的是不说不写，不说不等于没有，不写不等于不存在。而另一方面，只要有小报的存在，就会有八卦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正如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中萧红所说的，可能没有人记得我的作品，但一定会有人谈我的八卦。

因为八卦就是谈资嘛，饭局散了之后谁把谈资当回事情呢？当回事情的要么是小报记者，要么是书生文人，会去写一点记一点；或者是今天的“手机控”，在路上会编选点文字发给三两朋友看看。说白了，我之所以读白，先是被大白的爱情故事所吸引的，我就在想，人家的故事包括人家的伤痛，怎么就成了我的下午茶了呢？

这真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啊。

事实也是这样，当你沉迷多深，你就会用多深的时间来廓清这些沉迷，这倒并不是说一定能正本清源，至少能拨开一些迷雾，有时属于边读边拨，渐渐的，更大的诱惑便又出现了——我从一个人读到了一个圈子。我们今天也熟悉朋友圈，先是加QQ好友，然后是MSN，然后是博客和微博，再是微信朋友圈什么的，层出不穷……总之认识陌生人就只需摇一摇或扫一扫，这也意味着朋友的可靠程度变得越来越值得怀疑了，但我们不能因交友工具的此种变化升级而去怀疑真朋友的诚心诚意。把一个人放到一个圈子里去，这样他所激起的涟漪就扩散开去了，各式人物就会粉墨登场。读一个人有时难免会有点呆板乏味，但读一个圈子，诸如巴黎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，抑或中国的竹林七贤和《新青年》的圈子，就有意思多了。比如写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，如果刘大白之后写陈望道，陈望道之后写夏丏尊，夏丏尊之后写李次九，那只不过是我电脑上的四个文件夹而已，我要写他们的交集，写他们为什么来到浙江一师，谁叫他们来的，最后为什么离开，这样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闲笔写他们的私人交往，写他们是怎么在一起游湖喝酒的。因为这四个人不是说生来就是金刚来造反或护法的，不是的，他们首先是来谋饭碗来讨生

活的，然后才有志趣相投地做点事情。这样写，大约会有时代众生相的意味，因为那个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是诗人的基因、文人的性情，抑或是一个文人和时代的关系，这似乎都是具有穿越特征的。这正如一台大戏，不可能就一个主角是精彩的，其他都是陪衬，不可能的，在一个时代的舞台上，每个粉墨登场的人都是极有戏感的，问题是我们的兴趣点到底放在哪里。于我，一开始是放得很小的，比如我先前写过一本《向来风花雪月》，写跟杭州发生了情感关系的文人墨客，而且这种关系只是小概率中的情爱故事，比如鲁迅曾携广平兄同游西湖，比如郭沫若曾到杭州孤山来约会未果；比如郁达夫娶了杭州女子王映霞，还造了一座风雨茅庐。但那个时候，刘大白还在我的视野之外，因为他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，这倒反而成就了我今天的读白之旅，因为有新鲜感啊，有发现啊，虽然这种“发现”只是因为过去暂时被屏蔽罢了。

五四运动前后，凡想在文学上搞点新意思的人都作过新诗，这可以胡适为例。那时的文学革命，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，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说，革命是要用暴力行为的，或者说这种理论还没有一呼百应吧。初写新诗的人，未必在现代诗歌史上有地位，因为有的人对新诗浅尝辄止，有的也受当时的语言环境所囿，比如沈尹默，比如周作人，包括俞平伯这样的，后来都不写新诗了。但他们在新文学史上却是留了一笔的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他们当时是登高一呼的，这个高要看他站在哪个点上，是站在北平站在北京大学，还是站在杭州站在绍兴，抑或是在绍兴的一所中学里，这是大不一样的。读白就是希望从一个点，哪怕是杭州皮市巷的一个点，

能跟北京大学的红楼联系起来。

这样的读白，就使“白”的圈子越来越大了，一开始想跑它一圈算了，跑个四百米，但跑着跑着就停不下来了。有时则是剪不断、理还乱，因为理来理去没有头绪，也没有参考答案。老实说现在写这一类文字的条件要好多了，因为电脑上有搜索功能了。但其实你想要的很多东西，还是搜索不到的，所以还是要靠大量的阅读，这也正是“读”的本来之义。是的，像一粒石子投进湖中，它是会激起一层涟漪的，但这涟漪很快又平静了。那就得不断地投石问湖，但我又不是精卫，我不做这样的傻事也没这样的精神；我投了，湖里的鱼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，连湖里有没有鱼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照常理推论的。于是投着投着，我便顾自己走了，我要去写《读白》这一本小书了。

刘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诗人的传奇特性：早慧，叛逆，多情，且情事多舛，执教鞭，患肺病；从政为官又不忘著书立说，中年去世，身后寂寞……这让我想起了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，苏曼殊比刘大白更为疯狂和不羁，但刘比苏又更为丰富和深沉。这种深沉有时就表现为不苟言笑，城府颇深——因为从照片上看，刘大白先生是个瘦削且骨感的男人，有着一张劳碌而愁苦的面孔，长得既像诗人又像师爷。在民国初年的那么多绍兴文人中，似乎刘大白是最像师爷的人，无论外形内心，还是他的从业经历，但在本质上刘大白又是一位诗人，是一位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世界的诗人。

这个生于1880年的绍兴平水人，自小就有反清复明之志，后来得过优贡生，还曾膺拔贡，当时他还名叫金庆棪。



▲ 20年代的刘大白

他后来又多以“靖裔”自称，因为这就是他的名，所以早期他都自称为刘靖裔的。大白是他的字，而白的另一义即是罚酒用的酒杯之意，浮一大白，就是指罚饮一大杯酒。据说大白一名最早出现于1910年在北京某酒楼的落款上，当时他乘着酒兴吟了一首《我有匕首行》。当然文人之笔名，有如书画家的若干闲章，用哪一枚就看当时的心情了，往往要到德高望重之时，名号和落款才固定不变了。

也许有朋友要问，诗人本姓金为何复姓刘？照刘大白先生后人的说法，其原因是绍兴平水金姓家族祖上本姓刘，五代时在吴越王钱镠那儿做官，因“镠”“刘”同音，为避钱王名讳，取繁体刘（劉）字中的部分偏旁遂改刘氏为金氏。所以由金而又复姓刘，颇有点正本清源之意，因为这个复即是恢复和复原之意。刘大白当时自己取名为靖裔，笔名汉胄，意思即为自己是汉朝中山靖王的后裔。

因为姓刘而不姓金，后来他在遭清政府通缉时倒也给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烦。至于改名叫大白，那又是后来的事情了，这是真姓+笔名的结合。所以金庆棪也罢、刘靖裔也罢，都是过去式的，唯有刘大白，跟他的诗、他的文和他的为人，被载入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。

前面说起苏曼殊，是因为刘大白在浙江一师的学生曹聚仁曾这样评价老师：他那火辣的热情，却比苏曼殊还要浓厚些。

曹聚仁评人实际上还是颇为主观的，尤其是对自己老师和同学辈的评价。

其实刘大白自己也曾有诗悼曼殊的，一般诗人怀诗人，就不仅仅是在抒写和怀念而已，而是把自己的性情都要放进去的，他说苏曼殊是“非儒非侠亦非僧，人海逃禅俨上乘”。

但是大白自己却不逃避，似乎也无处可逃。

有人称苏曼殊是诗僧，而刘大白呢，人称是欧化老少年。欧化是他的立场，并非他是游欧人士；老少年是他的姿态，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种情状。他在浙江一师任教以及后来写出那些传世之诗句时，都已过不惑之年，然而照样把爱情诗写得浓郁热烈。

我有时也搞不明白，要写出好的诗句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？那个年代的诗人，似乎更多地在身体力行，而主题只有一个：革命革命再革命！这革命就是执教、办刊、论战、主政，所以这革命便轰轰烈烈，风生水起。今天如果我们从作品的成就来论人，那么像刘大白这样的白话新诗，可能还处在一种半文不白的状态中；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传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，那他完全是一个大写的人，有时是狂草，有时是正楷，但绝对是大写的。

早年我对刘大白没有多少感觉，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刘半农的诗人混在一起，因为他们都姓刘，且名字也都比较“土”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喜欢名字比较洋的诗人，比如戴望舒、康白情、孙大雨、林徽因、艾青、郭小川，以及后来的北岛、芒克、江河、舒婷等等。还有一个容易搞糊涂的是，刘大白和刘半农都写过反映底层生活的诗，又都曾由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为之谱曲。现在我当然能搞明白了，半农先生的是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大白先生的是《卖布谣》。刘半农的“教我如何不想她”倒是蛮洋派的，现在偶见纪念会上有人用美声来唱的，而大白的“嫂嫂织布，哥哥卖布。卖布买米，有饭落肚”则很像民谣了，这就是反

映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的，不过由此诗也可看出20世纪20年代初浙江萧绍平原上的商业形态了。刘大白是绍兴人，又在萧山谋过事，而今天的萧绍平原上，染织业是相当发达的，发达到影响用水卫生和整体环境了，可惜再也没有诗人写此类的《卖布谣》了——写也写的，是写企业家如何走向成功的。现在的演唱会上当然也见民谣的，但那已经是一种曲风而并非真的有多少对现实的批判，歌舞升平，皆大欢喜。

再扯开去说一下，往往要人到中年之后，才觉得大白、半农这样的名字实在是好，但是回到刚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又要让我“半农”，正如我刚刚在接受意象派什么的，你又要让我“大白”，那我肯定是受不了的，而且把诗写得“大白”也不是我的追求，而现在觉得包括戴雨农、汪静之这样的名字实在是很有中国味道的。

再扯远一点，这些老诗人的后代后来也有不少去海外定居生活的，赵元任、刘半农和刘大白的子女就有在美国聚会的记录，这有照片为证的。

诗人去写世间的不平、平民的痛苦，写不写是姿态，写不写得好是本事。

刘半农因为没有在国民政府里做过官，所以还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。而刘大白的一生就要复杂得多，他官至厅部级，远比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公务员要厉害。究其原因，鲁迅不是蔡元培的亲信，而只是许寿裳的好友，是蔡元培的外围好友——这一点跟周作人不一样，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。而刘大白则是蒋梦麟的朋友和得力助手，蒋梦麟是蔡元培之后执掌中国教育的又一个专家级行政长官。也因为这一层关系，在1949年后，是很难见到给刘大白先生

作传作评的——有也是有的，那多半也只是作为一个五四新诗人的几句评价，而且最后总不忘给他打上“躲避现实”和“悲观厌世”的标签，这也是那个年代惯用的腔调。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，然而名人的是非功过总是要后人慢慢来评说的，公允也总要慢慢才会来到的。这也正是时间的残酷和巧妙之处吧，因为诗歌的生命（如果其真有生命的话），总是要胜过诗人本身的生理年龄的。

刘大白先生去世已经有83年了，但愿我的这册小文是一种后辈向前辈致敬的文字，虽不够严谨和学术，然真诚可鉴，聊作怀念。